

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专刊

伟大的爱心

□林 非

鲁迅毕生都深深地挚爱着自己整个的民族，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在平等与自由、高尚和博大的人生境界中间。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点，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追求“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人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在完成了这样的目标之后，自然就可以达到“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的结局。他始终为此而英勇地呼号和奋斗。

鲁迅所渴望的“解放人性”（《坚硬清野主义》）的主张，以及“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热风·五十九“圣武”》），都是立足于民众的基础之上，认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学界的三魂》）。他认为即使是所谓的“天才”，也“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森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民众，就没有天才”（《未有天才之前》）。

在1936年的“12·9”爱国运动中间，当鲁迅知悉不少民众支援和慰劳游行的学生时，就十分激动地认为，“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谁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还从这里得出了富有哲理意义的结论，“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题未定草（九）》），坚决地认为自己的民族，尽管“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信）。

鲁迅深信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努力地进行发扬和建设，迫切地希望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中间，产生出更为辉煌的作用。鲁迅这种多么伟大的爱心，激励着我们准确与迅速地前进。

提高和升华全体民众文化、思想、道德与精神的境界，是鲁迅孜孜不倦地坚持从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民族，辉煌地站立和挺进在世界的前列。为了真正能够抵达如此的前景，鲁迅又提出必须“扫荡”那种“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笔》）的专制统治的严酷秩序。他针对那种蹂躏和麻醉广大民众的罪恶制度，全面而又深入地阐述了“改革国民性”的主张，就是为了促使人们的精神觉醒与完善起来，最终实现人性的解放。

鲁迅除开在促使广大民众完成精神境界的追求之外，对于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引起自己充分的关注。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中间那种深切关怀民众的情思，而且还升腾到了善良、美好与深邃的极致。像他在《长城》中所吟咏的“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真是远远地超越了当今许多人们普遍的认识。将长城这巍峨和壮丽的建筑，当做自己民族的象征，引为极大的自豪，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完全准确的。然而鲁迅于86年前所发表的此种见解，却比我们明显地深入了一大步，他在承认其不言而喻的伟大时，又发出了诅咒的声音，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因为它“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这位深谙历史和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在观察一切问题的时候，总是衡量它究竟是有益抑或戕害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将这作为根本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有时候在报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上，看到对于多少美味佳肴的介绍，立即就会使人想起鲁迅关怀广大民众的感慨，“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席，有烧烤，有翅膀”，“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灯下漫笔》），而且“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马上支日记》），说得多么的痛楚和深沉。当那些富豪或官僚们，奢侈地享受着山珍海味的时候，是否偶尔也会想起多少贫困的民众，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都是炎黄子孙，都是父母所生，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吧！

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鲁迅，时刻都在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呼号。他深切地关怀和热爱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深深地景仰和努力地学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



鲁迅像(局部) 集体创作

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用这一期专刊作为纪念。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我们为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文学家而感到骄傲。关于鲁迅的研究和阐释仍然在进行，鲁迅思想的“当代性”正是其生命力的体现。本期专刊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研究”性质，展现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鲁迅的敬仰和热爱，包括国外鲁迅研究界的认真和热情。非常感谢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先生，本期专刊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由他逐一邀约并落实。感谢广大作家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日本学者李冬木先生的付出。

——阎晶明

鲁迅学就是『人学』

□郑心伶

鲁迅是历史伟人，他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周氏鲁迅”真的走了。但鲁迅的精神、思想、人格及“鲁迅文化”、“鲁迅传统”并没有“远去”。“魂兮归来”，“鲁迅风”不会灭绝，鲁迅是永恒的。因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鲁迅及其光辉著作已成为“百年经典”，这是不争的历史结论。而当今社会，又确实没有活生生的新鲁迅。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大遗憾。“钱学森之问”就应包括“当今中国为什么没有鲁迅？”值得国人深思。

究其原因，当然除了客观因素，诸如“鲁迅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历史岂能重演，鲁迅难以“克隆”；主要还是当代文学家、思想家的主观世界未能构筑好、调整好。经验证明，缺乏“民族魂”的基因，没有一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加上政治气候、人文环境欠佳，是难铸大器，难植大树的。因而，要立鲁迅这样的真人，可谓难矣。

不过，现在总算好多了，以后还会更好。大小新鲁迅是一定能站出来的。只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待到真正的思想解放，人们的“内世界”与“外世界”都变得更宽松更自由了，敢说真话的真人鲁迅（当然不是原原本本的那个“周氏鲁迅”）就要当“弄潮儿”了。反正咱们中国人有足够的自信力，终究是可以端端正正地“立人”、做人的。

“鲁迅学”不是玄学，也不是考古学。它所研究的正是主张“立国”、“立人”、呼唤“救救孩子”的伟大鲁迅及其不朽著作。鲁迅研究有其鲜明的学术性、特殊性、现实性与批判性、战斗性。尤其今天，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最需要造就“四有”且又敢说敢做的新人真人。

而鲁迅，无疑是我们的楷模与镜子。“鲁迅学”作为人学，其宗旨也十分明确。如果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去索隐，去臆测，去戏说，那“鲁迅学”还存在吗？还要它干嘛？

鲁迅这棵大树不倒，鲁迅旗帜也不会被打住。我们要从鲁迅身上汲取无穷的智慧与力量，要让“鲁迅学”开张明义，突出“人”的主题，自由自主而阳光地做人。惟此，才不愧于鲁迅，不愧于时代。

鲁迅精神的内涵是丰富而深邃的，从哪个角度去探索去挖掘，都会有大收获。但学鲁迅先学其人格品行，求真务实而“立人”，造就新一代真人，则毋庸置疑。况且，人始终是关键。不然，鲁迅为什么要一再强调“人立而后凡事举”呢？

总之，当今中国，无论追寻“鲁迅在哪里？”还是探寻“魂归何处？”中国失去鲁迅，再加上没有了胡适等一批新文化人，我们在世界新文化之林还能立足吗？所以，不管你怎样评价鲁迅，怎样对待鲁迅，最终还是绕不开一个“人”字、一个“真”字、一个“爱”字。有了具有“真”和“爱”的“人”，才能发扬光大鲁迅精神！

（作者系广东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世界》《民族魂》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越是在一个躁动混乱的时代
越需要一个沉静倔强的灵魂

关于鲁迅，我已经说过太多的话，至今仍然有许多话想说。我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我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

鲁迅那个时代，是中国积贫、积弱，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代。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提出了许多政治的主张，影响最大的，有两大类：其一是晚清洋务派官僚的富国强兵的主张，其二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惟独青年鲁迅，对这两派的政治主张都表示了异议，另外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并且用“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两句话概括了它的含义。直至现在，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少有人提，即使讲鲁迅“立人”思想的，也鲜有人重视鲁迅概括其含义的这两句话。实际上，不论是晚清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的主张，还是改良派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着眼点都在国家物质整体形式的变化，并且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但是，当时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的大国，政府官僚和精英知识分子最多也只有几万、几十万，那么，剩下的那四亿四千多万的民众就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无关了吗？就只能消极地跟着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跑了吗？这些政府官僚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就一定能够将他们带到

幸福光明的地方去吗？如果万一没有将他们带到那样的地方去，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对当时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观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谁能保证其中的每一个都是百分之百地为了救国救民，而不会将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据为己有呢？我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鲁迅并不满足于当时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计划和改良派、革命派革新政治制度的政治主张，而另外强调“立人”的重要性了。

从国家整体的角度，一是要富强，一是要民主，除此之外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了，但从个人的角度就不同了。一个人要活着，当然也得有物质的条件，但只有物质的条件，还是远远不够的，《红楼梦》荣、宁两大家人，仅就物质的生活，可谓已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但到头来，反倒是刘姥姥比他们过得更有些滋味，因为她到底还是靠着自己的那点聪明才智支撑着自己一家的生活，也理所当然地得到自己儿子和媳妇的一份真诚的爱心的。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当然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刘姥姥了。但其中的道理还是相通的：幸福是心灵内部的，而不是心灵外部的，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并且是个人对个人生命的体验，得有点主见，得有点个人的意识和个人做人的尊严，光随大流是不行的，光人云亦云是不行的，更莫提巧取豪夺、趋炎附势、吹牛拍马、骄奢淫逸了。人，还是有人性的，有无人性，是只有自己最清楚的。在表面上，只有物质的才是最真实的，只有真金白银和个人权势才是最真实的。但在人的精神感受中，真实的却不是那些东西，而是爱和自由，物质的东西只有成为爱和自由的保障的时候，对于人才是有真实的价值的。一句话，要立人。要人成为一个，成为有个性、有人性的人，就不能痴迷物质的东西，就要重视精神的东西；就不要受别人、受多数人的束缚，就要重视个人体验中的东西，重视个人与其他多数人不同的东西，发挥其他人无法发挥作用。在这个愈来愈密集的现当代社会中，如果全国人都抢一样东西，就把这个世界抢乱了，抢翻了，抢到最后，还不是人吃人？

我之所以说我们现在仍然需要鲁迅，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中国似乎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崛起的大国”，晚清官僚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基本实现，虽然在政治上还要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但自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从英美留学归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都在关心着这件事，按理说，也应该不是一个多么高不可攀的事情。但中国现实社会的人的精神面貌却依然不是那么令人惬意的。我们富了，强了，政治民主的意识加强了，但我们的“幸福的指数”反倒降低了，患精神忧郁症的人似乎比鲁迅那个时候还要多，一些根本令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几乎天天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在精神上出了问题吗？

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20岁以上的中国人，在读完《论语》之后，不妨再抽上一个月的时间读一遍《鲁迅全集》，或许不是一点益处也没有的。

（作者系汕头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

中国需要鲁迅

□王富仁

果在21世纪继续阅读鲁迅还有意义，那就在于这种源自殖民地的体验可以给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下的我们以充分的参照。”

上述四位日本学者在以往鲁迅研究基础上，或者提出新观点新视角，或者对鲁迅文本有独特深入的解析。而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则是对与阐释对象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有全新的开掘和理解。

当阐释背景被大大延展开来之后，鲁迅思想文学的一些新面向就会得到光照从而凸现出来，形成对于鲁迅的新认识。换言之，对历史的复杂多元关系性和结构性的崭新理解，必将推动对于鲁迅之价值和意义的重新阐发。如果说，北冈正子是通过复原明治40年代（1900年代）积极吸纳西方各种思潮而形成的日本思想论坛的风貌和历史结构，从而对身处其中的青年鲁迅其思想选择的独特性有了新的理解，那么，丸尾常喜则是以发现“鬼”的存在为契机，将观察鲁迅的视角有力地延伸到深广久远的土俗民间世界，发现了新文学代表性作家鲁迅与中国旧历史乃至被遗忘的民俗世界的深刻联系，从而对其小说里的荒诞幽默世界和黑暗的人物获得了全新的阐释架构。藤井省三由于开拓了观察鲁迅的俄罗斯视角，尤其是俄国革命影响下20世纪初东亚社会历史的复杂结构，使他注意到1920年代绝望与彷徨的鲁迅其思想文学与一般新文化先驱的不同倾向，虽然“鲁迅对布尔什维克的怀疑和恐惧”这一观点还有待论证。而代田智明对1930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殖民地文化与鲁迅晚年思想文学之批判性关联的考察，则更开拓出了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全新路径。

我想，邻国日本上述鲁迅论的业绩，或许可以给面临深化的21世纪中国鲁迅研究以有益的启示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

如何深化21世纪的鲁迅研究 ——以日本为参照

□赵京华

的怀疑和恐惧，转而探索和倡导不同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革命”和胡适等“改良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代田智明在《解读鲁迅》（2006）中论及1930年代的《故事新编》和杂文创作时，则更特别注意到鲁迅对以上海文化为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的尖锐批判，认为生存于殖民地环境中的鲁迅无法获得全部现代性的主体，反而造就了其反思和跨越“现代性”并走向后现代批判的契机。因此他强调，“如

本专刊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